

習近平強勢領導 顯改革決心

國際
視野



潘迪藍
Gavekal
Dragonomics
資深經濟師

11月15日，中共領導層公布的一籃子重磅政策，外界對習近平改革決心的疑慮，一掃而空。很明顯，習近平確實是改革者。他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中制定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包括：繼續果斷推進市場化，略為放寬「一孩政策」（實行「單獨二胎」政策，夫婦二人其中一人為獨生子女，即可生育第二胎），廢除嚴苛的「勞動教養」制度，並且在稅收、土地使用權、國有企業制度等眾多領域建議展開重大改革。

習近平上台後，分析員提出了三大疑問：對於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習近平和另外6名政治局常委是否已經有可靠的診斷？他們是否有合理可行的計劃以解決問題？他們有沒有足夠的政治實力去抗衡大型國有企業、富商、地方政府官員和其他利益團體根深柢固的阻力，推行改革？

消解三大疑慮

直至對上一個星期，一般人對前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不太肯定」，至於第三個問題的答案，則是「很可能不夠」；但現時，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全部都肯定的



國家主席習近平（左）表明，中共高層中只能有一個話事人，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在國營媒體有關三中全會的鋪天蓋地報導中，總理李克強（右）幾乎無影無蹤。（資料圖片）

「是」。

由習近平上任第一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和其他行動看來，特別是令人意外的大膽反腐，顯示了他與前任的胡錦濤相比，是一個更有遠見和更加強勢的領導人。他已經為解決中國的深層次治理問題，設立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軌道，並正在迅速地建立助他克服阻力、達到目標的官僚機器。

減少政府干預 改善社會福利

當然，習近平不一定會成功。他這種風格的獨裁專制和高度中央集權的領導方式，最終亦迴避了一個實質問題：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體，還可以由一黨專政掌控多久？但毫無疑問，在未來幾年，中國將會比過去十年更加堅定的向市場化的方向邁進。

在11月15日公布的改革細節之中，有三個重點特別突出。第一，習近平的目標，是要對中國進行更加廣泛的治理改

革，而不僅僅是狹隘的經濟改革。儘管經濟發展仍然是首要任務，習近平的改革目標，並不只限於提高經濟效率，還包括改變政府的職能。

廣義來說，這將迫使政府部門避免直接干預市場，並重新將它們的注意力集中在5個關鍵職能：宏觀經濟管理、市場監管、提供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簡單來說，將治理工作做得更好，就是習近平的中心目標。

這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大多數的經濟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浪費、工業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務等，最終都不是市場問題，而是管理問題。

特別是地方治理的問題，各地方政府一味追求投資和GDP增長，並未優化公共服務及財政制度，以防止社會福利出現問題。地方政府的收入，並不足以支付當地必須的社會福利。

因此，習近平強調重新讓政府去提供社

會福利，並改革財政制度以配合這進程，是受到歡迎的。

確認市場「決定性」地位

第二，與上屆政府傾向國有企業的政策相比，今屆政府強調的市場化改革是一個180度的大轉變。

《決定》的第一個實質部分，就是強調在資源配置方面讓市場擔任「決定性」的角色。相比之下，內地政府自1993年以來發表的所有主要政策聲明，都只是說讓市場發揮「基本」的作用。

這不單只是字眼上的轉變。很多圍繞該策略的官方解說已經明確表示，其目標是要減少各級政府操縱價格以及分配關鍵資源的能力。

雖然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解除對各種產品的管制，並較少介入市場，但在過去20年，政府仍然以多種方式來干預市場，包括對心儀和青睞的企業補貼資金、能源、土地；錯綜複雜的營業執照和批核制度，令人們不必要地難以成立新企業；在多個行業正式和非正式地限制私人投資，還有妨礙商品和資本由一個省轉移到另一個省的保護主義壁壘。

習近平的改革的明顯意圖，是要削弱所有這些反市場的做法。這與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做法有明顯的分別。胡錦濤和溫家寶在2003年發表的第一份重大政策性文件，主要集中於增強國有企業的體質，很少注重提高市場化的問題。

加強集權 確保改革成功

第三，習近平是一個正在迅速集中權力的強勢領導人。

上屆政府的兩大問題是，胡錦濤和溫家寶都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解決官僚機構之間的爭吵和糾紛，或者削弱強勢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旗下安全部門官員影響力。但習近平卻表明，首先，中共高層中只能有一個話事人，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在國

營媒體有關三中全會的鋪天蓋地報導中，總理李克強幾乎無影無蹤。

他成立了兩個新的黨政機構，專門處理在過去5年拖慢了經濟改革的權力鬥爭，一個是「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類似其他在關鍵領域協調政策的黨務領導小組；另一個則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兩者的功能，看來是要令習近平和他的親信，包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可以解決機構之間的爭端，並確保必要的經濟改革不會被偏執的安全部門官員「綁架」。

國企改革仍不夠積極

這份本是毫不含糊地傾向市場經濟的文件的最大問題，或許在國有企業的角色方面。雖然習近平建議，政府從操控市場的角色中淡出，但同樣清楚的是，政府作為關鍵經濟資產的直接擁有者的重要角色將保持不變。

雖然《決定》包含了某些改革國有企業的建議，例如將它們向中央上繳的盈利比例，由現時的10%至15%，提高至30%，並鼓勵私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的投資項目，但它仍然為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保留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表面看來，《決定》缺乏對國有企業推行更積極的改革或私有化計劃，困擾了很多經濟學家。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生產力增長下跌和債務爆炸式地增長，都是由於龐大的國有企業持續不成比例地吞噬了銀行信貸和其他資源，但它們的投資回報卻愈來愈低。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對於中國的經濟管治架構改革，習近平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亦有其意志和政治技巧來實現他的許多目標，他的計劃卻可能無法讓「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滿意，因為他的目的是提升國企效率，而不是私有化國企。不過，他或許能夠有效維持內地經濟再快速增長多10年，讓共產黨繼續舒適地掌握着權力。